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明年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也即走過了「五十年不變」的前半段路程。香港的未來何去何從？敝刊計劃於明年6月刊出紀念專輯，誠邀各界學者參與討論，尤其歡迎惠賜學術論文。

——編者

史實建構的多元與客觀

就近代中國東北殖民史研究而言，不同國籍的學者基於各自的思考，從不同角度展開探討，往往呈現出紛繁蕪雜的敘事樣態，結論也千差萬別。林曉萍的〈在「東北」與「滿洲」之間——近代東北殖民史書寫〉（《二十一世紀》2021年10月號），細緻地梳理了1970年代以來多語種的相關研究成果，在釐清該領域的學術脈絡、揭示其研究趨勢方面貢獻非凡。該文認為近代東北殖民史可以分為以「東北」為出發點和以「滿洲」為出發點的書寫兩種類型。前者又可細分為侵略（淪陷）史書寫、解殖視角下的個體生命史書寫、雙重視角下的現代化歷史書寫三種；後者可分為國家史書寫和地域史書寫兩類。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主流學界堅持民族國家立場，重點

呈現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和東北人民反侵略的歷程；台灣學界也有類似書寫。解殖視角主要出現在文學領域，試圖突破「合作/抵抗」二元敘事模式，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討東北民眾個體的生命體驗，其中隱含着反殖民、反男權等諸多混雜因素，且研究者不限地域和國籍。雙重視角既承認日本的殖民主義，又認為日本的侵略客觀上帶來東北的現代化。但中國學者更強調這背後的殘忍性和掠奪性，日、美學者的見解則呈現出多元性。國家史視角主要為日本學者採用，他們或認為「滿洲國」是名義上的國家，或強調其「理想國家」與傀儡政權的雙重屬性。地域史視角則試圖突破民族國家的傳統進路，將中國東北作為一個具有多重地緣政治的地理空間，考察該地區的緣起與走向，這一視角同樣多來自日本學者的研究。

該文試圖撇開意識形態的藩籬，從純學術的角度、客觀地分析近代東北殖民史的書寫模式，這種努力值得讚賞。然而，在當前的國際關係和民族主義語境中，東北殖民史的書寫很難做到絕對客觀。套用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建構論可以發現，中

日雙方都從各自角度對東北殖民史進行建構，即便日本學者多元的闡釋模式，也很難跳脫大環境的束縛。而歐美學者似乎可以超脫事外、以相對中立的立場看問題，但他們往往缺乏對中日糾葛及其民族心理的深刻體驗，材料解讀方面容易出現某些問題。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期待各國學者能夠拋開歷史包袱，以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關懷，共同推進近代東北殖民史的研究。

徐炳三 武漢

2021.10.25

當家不作主

「解放」究竟對工人意味着甚麼？1949年建政後，中共宣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政治上，工人獲得了崇高的地位，開始「當家作主」，但在福利待遇方面是否亦得到改善呢？

李蔚暄的〈福利的博弈：上海六大公用企業實行《勞動保險條例》始末（1950-1956）〉（《二十一世紀》2021年10月號）一文揭示，建國初期一些工人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卻被降低，造成了所謂「勝利的困境」。1949年前，上海六大公用企業的中國籍職工曾因為退職金問題與外國資方展開多次較量，中共則藉機組織發動工人罷工。結果，中共不僅成功地幫助工人爭取到優厚的福利待遇，還在工人中擴大了影響力，獲得支持。為提高工人福利待遇，1950年10月，中共公布《勞動保險條例》草案，並於

1951年2月在全國範圍內正式頒布實施。然而，對六大企業的職工來說，該條例遠不如原有的規定優渥，工人因此非常不滿。儘管中共的宣傳機器宣稱新條例的優越性，但工人並不買賬，《勞保條例》在六大企業中的實施也是反反覆覆。

根據官方的宣傳，工人都是無產者，彼此沒有差別。事實上，基於地域、技能、性別、職業、年齡的不同，工人的生活狀況千差萬別，六大企業的工人待遇顯然就遠在工人的平均水平之上。《勞保條例》對不少工人來說是福音，對六大企業的職工來說卻是既得利益被剝奪。由此可見，工人群體並非一模一樣 (monolithic)，而是分裂成多個次群體，不可一概而論。但分裂並不意味着被動。1949年後，工人仍在積極地爭取權益，與政府討價還價，儘管他們通常是失敗的一方。

為何1949年前六大企業的工人能成功要求資方提高福利待遇，「解放」後卻做不到呢？李蔚暄沒有作出解釋。安舟 (Joel Andreas) 的新著《脫嵌：中國產業公民權的興衰》(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提供了一個分析的視角可供參考。1949年後，中共給了工人「產業公民權」，工人不再只是被工廠僱用而已，而是擁有了鐵飯碗，成為工廠的持份者，亦即獲得了所謂「主人翁」地位。產業公民權理應可以保證工人對工廠享有管理決策權，然而中共卻嚴格限制了工人集體行動的自由，也阻礙了政治

參與。因此，工人在黨國面前沒有足夠的議價能力，只是當家，並不能作主。

毛升 香港
2021.10.31

以微觀視角探視宏觀歷史

張寧的〈革命、工分與再教育——上山下鄉運動時期江西雲莊村的案例〉(《二十一世紀》2021年10月號)在題目上就讓我眼睛一亮：大詞「革命」與小詞「工分」的懸殊落差，承接着我們一代知青的「再教育」歷史。顯然，作者是從小處作大文章，試圖以工分的微觀視角探視革命的宏觀歷史。

作為微觀視角的個案研究，張文充分地利用民間敘事文本，迥異於官方敘事與知青主流話語，與官方檔案材料進行對比與參照，勾勒出一幅較為完整的上山下鄉運動圖景。張文聚焦於知青在農村生活中習以為常卻在各種知青敘述中語焉不詳的現象——工分，闡述了一個宏觀的三部曲上山下鄉運動史：知青經歷了從擁護「農業學大寨」，幫助國家教育農民；到認同農民，與農民一起對抗國家；再到與農民「爭工分」，捍衛自身利益的轉變。這個過程可視為從紅衛兵到知青，再到「新社員」身份與角色的歷史轉變。

上海知青下鄉到江西雲莊村一年後，需要完全自力更生。圍繞着生計問題，知青群體內部發生了分化。「革命派」青年基於理論思考：「究竟是種田為革命，還是種田為工分？」終究抵擋不住「現實派」青年的「爭相出工，經常大聲討論工

分值、出勤天數」。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革命信念逐漸遭到瓦解，堅持官方革命立場的「革命派」青年最終轉向了現實主義立場。「工分掛帥」從知青教育農民的革命武器，變為農民對知青進行再教育的話語。由是，工分問題也就成為知青與農民利益之爭的集中體現。

「知青與農民的工分博弈」一節，是張文論述、分析最為精彩之處。事實上，公社幹部代表國家屢次介入知青的工分問題，強制生產隊提升知青底分，以強迫農民犧牲自身利益的方式滿足知青的需求，加劇了知青與農民的矛盾，由此也顯示出農民對國家發起上山下鄉運動以及政策偏向的不滿。

張文所利用的資料主要是上海知青王宗仁的日記、筆記、書信以及勞動手冊等。此外，還採訪了王宗仁等上海知青。然而，這些資料的分量尚顯不足，缺乏更充分的代表性。張文最為缺乏的是來自農民方面的一手材料——對農民(包括基層幹部)的訪談資料，仍多是採用二手資料。儘管「農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認知與應對」一節，對農民的訪談來自原大隊黨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以及村民等；在其他章節，出現過對時任村委會主任等人的訪談記錄，但是這些資料所應用的篇幅都十分簡略而有限。

眾所周知，歷來知青研究中，農民的聲音十分稀缺，作者曾對雲莊村村委會幹部和村民進行採訪，本來僅有一次採訪已嫌不足，作者仍未能(或沒有意識到)充分利用這次彌足珍貴的訪談，十分可惜。

王力堅 桃園
2021.11.2